

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的性別 處境與政治

畢恆達（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謝慧娟（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儘管有很多證據顯示男性與女性研究者的田野研究經驗不同，但是質性研究方法的書籍仍然持續忽視田野研究的性別差異。近年來研究者受到鼓勵反省其在研究過程中的角色，然而研究者的性別與研究田野的互動卻仍然受到忽視。本研究的目的即是探討台灣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的性別處境與性別政治。

當研究者進入田野，田野中的人會試圖把研究者放入一個位置，給她定位，研究者也同時在找尋一個適合於她的位置。根據受訪者的陳述，田野對象給她的定位其實反映的就是一般社會的性別價值。雖說因著女性研究者的年齡、學術位置與穿著等而有些許差異，但是最常見的遭遇即是忽視女性研究者的專業角色，而把她們當作是一般傳統女人的角色，如視而不見、作為服務者，以及女性的身體成為關注的焦點。本文同時討論女性研究者因應的策略，以及在這樣的脈絡下，女性研究者如果順勢利用女性的優勢與田野對象互動，其後果為何？最後則分別討論研究者的性別理解如何影響其田野研究的進行，以及知識生產的結果。

關鍵詞：性別政治、田野研究、女性研究者

收稿日期：93.6.23；定稿日期：94.11.2

前言

翻開社會科學的文獻，初學者找不到關於社會研究實際上如何進行的資料，因為社會學家不太報告他們的活動，並且把個人的研究經驗和發表的論文分開。女性主義者 Shulamit Reinharz (1984) 指出，圖書館充斥研究的「發現」(findings)，卻很難找到有關實際研究過程的文獻。教科書上的方法教導讀者研究「應該」怎麼做，卻沒說「實際上」是怎麼做的。研究報告描述的不是使用的邏輯(logic-in-use)，而是建構的邏輯(reconstructed logic)。報告往往根據規範準則撰寫，不報導實際的研究經驗。

這種在學術論文中隱藏研究過程的現象加強了社會學的「科學理想」(ideal) (Reinharz, 1984)。社會科學企圖仿效自然科學，採用保持距離的研究方法，否定研究與研究者／研究對象的階級、性別、歷史和情境的連結。研究應該是客觀、價值中立的。科學研究可以重複測試，因此經由不同研究者來操作，應該會發現相同的事實，得到相同的結論。研究者的主觀性應該排除在研究之外，以免污染了研究。因此，社會科學方法的教科書只會談論信度、效度、統計分析、問卷設計、資料分析與撰寫，但是研究者的自我總是在其中缺席。

不過西方社會學與人類學界自 1960 年代晚期，逐漸有學者開始對於研究者角色展開深刻的反省。這種反省主要受到幾個學術脈絡的影響：

1. 研究者的內在價值衝突。人類學宗師 Bronislaw Malinowski 死後私人日記的出版 (1967)，引起人類學界震撼與反省。原來人類學

致謝辭：謝謝所有受訪者以及其他願意與我們分享研究經驗的研究生；謝謝台灣大學社會系的吳嘉苓老師以及四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家雖然外在表現儘量客觀、超然，其實仍然無法超脫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所擁有的情慾或情緒。

2.研究者文化與權力優勢的消滅。人類學隨著殖民帝國的拓展而勃興，研究者經常得到殖民政府資助，為裨益統治管理而進行研究。其後被殖民國家紛紛獨立建國，人民教育程度提高，也有能力閱讀人類學報告，並進行批判。面對這些質疑，西方人類學家不得不反省所謂絕對客觀的知識與其背後的權力關係。

3.相同的田野，不同的詮釋。當相同的田野，由不同的人類學者研究，卻得到極端殊異的結論時，帶給人類學界很大的困窘。例如 Margaret Mead（1949）與 Derek Freeman（1983）針對三毛亞（Samoa）的研究，以及 Oscar Lewis（1951）與 Robert Redfield（1973）關於墨西哥村落的研究爭議。

4.詮釋學的啟發。詮釋學認為先前理解是使我們理解事物成為可能的基本條件，理解過程不存在一個外在於歷史與語言的阿基米德點（Gadamer, 1989）。研究者既然無法自外於理解的過程，就應該將之作為反省的對象。

5.女性主義的反省與挑戰。女性主義認為知識植基（situated）於特定的社會文化情境之中（Haraway, 1991; Harding, 1991），強調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是平等互惠而非宰制的關係。在這樣的學術脈絡下，有關研究經驗反省的論文與專書也漸漸出現（如 Ellis & Flaherty, 1992; Hobbs & May, 1993; Jackson & Ives, 1996; Reinhartz, 1984; Shaffir & Stebbins, 1991; Smith & Kornblum, 1989, 1996; Wengle, 1988），不過田野研究中的性別政治仍然受到一般質性研究方法教科書的忽略。1985 年女性研究者 Joan Neff Gurney 呼籲「儘管有很多證據顯示男性與女性研究者的田野研究經驗不同，但是質性研究方法的書籍仍然持

續忽視田野研究的性別差異」(Gurney, 1985: 42)。十二年後，Rebecca Horn 仍然指出「研究者受到鼓勵反省其在研究過程中的角色，然而研究者的性別與研究環境文化的互動卻仍然受到忽視」(Horn, 1997: 297)。台灣的學術出版其實更是如此，本土的研究方法（即使是質性研究）書籍（如高敬文，2002；黃瑞琴，1994；齊力、林本炫，2003；謝臥龍，2004等）幾乎不討論性別議題。胡幼慧（1996）與潘慧玲（2004）所編輯的書中分別有一個部分講述性別，但仍是以討論研究的主題內容為重點，而非研究者的研究經驗過程。不過，近年來在單一的經驗研究論文中針對研究者的田野研究過程進行描述與反省的數量確實有增多的趨勢（如嚴祥鸞，1997），尤其是學位論文（如林秀芬，2002；唐筱雯，1999等）。

女性研究者與田野

Lois Easterday、Diana Papademas、Laura Schorr 與 Catherine Valentine（1977）等研究者指出，作為從事田野研究的單身女性，遭遇到許多因為這個角色而有的研究問題，可是研究方法的課程或教科書只教導如何蒐集、記錄與分析資料，將研究者視為一個普同的人，而沒有告訴學生／讀者性別對於研究關係的影響。她們從自身的十二個田野研究（包括博物館、學校、太平間化妝師、醫療團隊、軍隊攝影計畫等）中歸納，對於其中性別角色與權力關係進行分類，然後討論田野中各種不同性別角色關係的長短處，並對於年輕女性研究者如何在田野中減少因其性別角色而遭傷害提出建議。她們歸納出田野研究中的五種性別角色關係：

1. 兄弟關係：研究者要熟習田野語言，成為田野對象的哥兒們，

否則就會遭到排擠。

2.調情或追求：田野中的男人對女性研究者所問的問題草草回答，卻熱衷於研究者是否已婚、是否有男朋友、週末晚上有沒有約會。

3.跑腿的：驅遣研究者做這個做那個，並且視為理所當然。

4.幸運符、吉祥物：田野對象會表示「有一個漂亮女孩陪著真好」；我們很高興有妳作伴；或者，雖然這次不能讓妳觀察，但我們都還是很愛妳的。

5.父女關係：年老的男性會把研究者當成女兒來教導、保護或教訓。

這些學者進一步指出女性研究者沒有受到嚴肅地對待，有時候也可能帶來好處，例如進入男人難以進入的田野；因為年輕女性研究者被認為沒有掌握權力、不具威脅性，因此研究對象會允許她聽到某些事情。女性研究者則可趁勢運用女性特質來操縱男性研究對象以獲取資料。女性研究者如果要避免田野中的不利處境，她們建議可以先表明（或宣稱）在家鄉已經有男朋友，將時間平均分配給所有的人（不讓特定報導人獨占研究者的時間），以避免和某個田野報導人發展過度親密的關係；不和研究對象談論研究的細節，並盡量從其他不同來源獲得訊息以為檢證。

除了上述幾種性別角色關係之外，Carol Warren 與 Jennifer Kay Hackney（2000）指出另外二種關係。1.名譽男人（the honorary male）：白人、年紀大、又非當地人的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有可能被當成名譽男人（具有雌雄同體），因而得到允許，可以從事跨越傳統性別界線的事情。2.間諜：男性研究者擁有較多權力位階與資源、接近政治，所以比較危險，容易被田野報導人視為間諜；女性研究者雖

然離權力較遠，但是卻有美人計的疑慮。Gurney（1985）以其在警察單位進行研究的經驗，發現田野報導人經常將她擺放在傳統受宰制的女性角色：一個是正如 Easterday 等人（1977）所提的跑腿角色，男警察要求她擔任祕書、記錄與整理檔案的角色。管理檔案的工作當然對於研究有所助益，但是也讓她很難有機會能夠進入觀察決策過程。當她表示想參與重要案件觀察時，男警察經常有意無意地遺忘她。另一個角色是啦啦隊隊長，男警察要她幫忙注意媒體有關他們單位的報導，喜歡在她面前談論成功的大案子，她似乎被迫要傾聽，並且要流露出驚訝而崇拜的眼神。

歸納上述文獻可以得知，田野報導人基於傳統主流性別價值，會將女性研究者編派到傳統女性的角色，例如女祕書、情人、女兒、女間諜，卻忽略了其研究者的角色。女性研究者需要熟悉田野男性的遊戲規則和能力，或與之成為哥兒們，或善用女性特質的優勢來與田野對象建立關係，或者藉由中性穿著以及年齡與階級的優勢以成為名譽男人。但為求彼此關係的和諧與維繫，往往難以抗衡田野中的性別歧視。如何凸顯自己的專業能力，成為值得信賴的研究者，一直是女性研究者所面臨的困境。

研究方法

本研究希望能夠理解女性研究者因為身為女人而遭遇怎樣的性別處境與性別政治，而其性別先前理解又如何影響她對於性別差別待遇的反應或行動？找尋受訪者的管道主要有二種，一是閱讀國內田野經驗研究的學術論文，主動邀請作者接受訪談（受訪者 F, H, K, W, Y）；另一是經由學術同儕轉介正在進行田野研究的女性；共訪談了

十三位女性研究者，其年齡從二十餘歲到四十餘歲（其中四人已婚），其學術位階從大學教授或研究員、研究助理，到研究生，而其學術領域則包括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與空間規劃等較常從事田野經驗研究的領域。訪談初始，先由研究者簡單解釋本研究的方向在於發掘女性研究人員在田野中所面臨的性別處境，並由既有的國內外相關文獻事先整理出一個訪談架構；然而當受訪者一聽到「田野工作中的性別議題」時，她們第一個想到要訴說的竟然是性騷擾與性侵害。這種回答的一致性代表甚麼？受訪者好像在答填充題，而且都有標準答案。研究者於是暫時放棄那些「看起來很有組織、有架構」的訪談大綱，不再一開始就用它來引導受訪者；轉而先單純地去問女性研究者的研究生涯體驗，甚至連「性別」這兩個字都不先提起，讓受訪者自行決定她最想要談的話題，然後再從她的敘述中追問後續的問題（訪談大綱），企圖從貼近受訪者生命史的角度去瞭解性別究竟如何在其中發生作用。

每次訪談至少兩小時，最多達六、七小時。訪談不以一次為限，由於受訪者的田野經驗非常豐富，必須在初次訪談後，發掘進一步的問題做後續訪談，有的受訪者曾先後進行三次訪談。而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之中，在學校碰到認識的女性研究者或專業者，知道研究者在進行有關田野性別處境與政治的研究，也會主動聯絡來討論其田野工作中的性別經驗。

研究發現與討論

做為生理上的女人，在田野中不可避免地將遭遇某些不同於男人的處境，這些遭遇可能源自她的身體與性慾特質，也可能源自她在社

會結構的位置。這兩項因素有著跨文化的普同性，不論該田野是異文化或同文化，女性研究者都面臨相同的問題。而外國文獻中的實例更增加了此一普同性的廣度（Warren, 1988）。

本論文將舉例說明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的實際遭遇，並更進一步討論女性面臨這些處境時，如何因應。不同處境下的女性必須屈從或違抗當下的性別規範，才能達到工作的目標，其中並無一致的規則可循，她們得視情況而採取不同的因應策略或行動。

當研究者進入田野，田野中的人會試圖把研究者放入一個位置，給她定位，研究者也在找尋一個適合於自己的位置。根據受訪者的陳述，田野對象給她們的定位其實反映的就是一般社會的性別價值，雖說因著女性研究者的年齡、學術位置與穿著等而有些許差異，但是最常見的遭遇即是忽視女性研究者的專業角色，而把她們當作是一般傳統女人的角色，如服務／照顧者、慾望的對象等，女性研究者必須費心表現，其專業角色才會讓人看見、認可。以下討論部分的前三節，分別處理常見的女性田野處境，亦即貶抑女性、女性作為服務者，以及女性的身體成為關注的焦點，並同時討論女性研究者因應的策略。接下來的一節，分析在這樣的脈絡下，女性研究者如果順勢利用女性的優勢與田野對象互動，其後果為何？而研究者的性別先前理解又如何影響其田野研究的進行，以及知識生產的結果。

（一）貶抑女性研究者

在一個由男人所主宰的田野中，女性研究者很難建立研究者的專業角色（Gurney, 1985）。初入田野，女性研究者還沒有機會從長時互動中展現自己的專業，田野報導人因為不熟悉女教授、女研究者的社

會位置，因此經常對女性研究者或視而不見；或使用貶低女性的稱呼，將研究者放在次等的社會位置；或隨意應付研究者的問話，將注意力集中在女性研究者的身體情慾或者其他同行的男性研究者；或者將女性研究者編派到田野中的婦女事務領域。無論是哪一種方式，都是將女性研究者與研究或公共事務隔離，看不到研究者的專業角色。

1. 視而不見。一位女研究生與共事的男性研究助理到台灣南部進行調查，同行的有某工業研究機構以及該地鄉公所的工作人員，整個調查團隊只有她一位女性。她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奇怪的狀況裡：「開會的時候，我發問，鄉公所的人卻對著男助理回答，我又針對他的回答發表意見，他還是對著男助理回答，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似的。」同樣地，在一個台北迪化街歷史保存的訪查工作中，當地的男性受訪者殷勤款待男性研究生，然而女性研究生卻只能在一旁站著。根據女研究生的描述：「我和同組男生去拜訪男性老闆，他邀請我的男同學上座，而我卻是在旁從頭站到尾，他也不想搬另外一張椅子請我坐。」另外一位女性研究者到田野調查時帶著她的男性朋友同行，男性受訪者卻只顧著和她的男性朋友講話，而無視女性研究者的存在。

主辦者是阿春，可是觀光局來的官員只對著團隊中年紀最大的老唐講話。他真的是先挑男的，再挑男的當中年紀大的，然後根本當作沒看見阿春。事實上老唐只是跟我們去玩的，根本和那個田野沒有關係。

視而不見並非意指報導人沒有看見女性研究者，而是在他們的傳統認知中，很難想像有女教授、女研究者這種社會位置。女人出現在田野的研究情境中，是位置的錯置（in the wrong place or out of

place)，除非她是祕書、小姐，才有出現在田野的正當性。

2. 使用貶抑女性的稱呼。女性專業角色在田野中的隱身（invisibility），很清楚地展現在田野對象對其之稱呼。不論她是研究者、教授、規劃師，一律被稱為小姐。女性研究者彷彿沒有正當的身分。擁有博士學位、在國外大學任教的 L，在中國大陸從事小城鎮的經濟發展田野研究時，卻沒有人願意嚴肅地以女教授的身分對待她。她說：「在田野裡，即使是正式場合，我一律被稱呼為某小姐，我無法要求他們稱我某博士或某教授，雖然那是我正式的頭銜。」年紀更輕的女性研究生則經常被社區男性稱為「妹妹」、「小丫頭」，她們雖然心裡覺得不是滋味，還是很怕「會不會誤會人家的善意」。正如 Gurney（1985）所言，女性研究者經常認為田野對象很好心地讓她進入田野、提供資訊給她，所以很難認為他們會因為她是女人而貶低她。通常是經由反思以及與同儕討論之後，才慢慢會承認報導人確實沒有對她那麼好。這種貶抑女性研究者的稱呼，反映的是田野報導人不願意正視女性研究者的專業身分，用這樣的稱呼將之置放在一個較低的次等社會位階，並維持男人所享有的宰制地位。

3. 虛與委蛇。從事規劃工作已經六年的 C，談到她經常接觸的地方政府官員的一般態度：「即使妳用一個專業者的身分去拜訪他，他的態度還是——女的怎麼會是專業者？妳會什麼？妳懂什麼？可是他們對男規劃師就不會有這樣的質疑。」於是當女研究生嘗試與里長討論對於社區事務的看法時，里長「心不在焉就只是簡單地說道，『對啊，是啊』」。遇到這種情形，有些受訪者表示，通常假裝不知道他們的差別對待，繼續留在那兒努力地「旁聽」與「插嘴」，要不然就是搬出研究者的身分，「證明」自己還是懂一些東西，「夠資格」和對方討論。有的猜測也許是穿著過於年輕，於是下次再到田野拜訪

時，就會刻意穿上套裝以凸顯自己的專業角色。

4. 女人家的事。根據社會的性別期待，專業的領域屬於男性，而女性則被期待應該要待在家庭領域。Warren 與 Hackney（2000）也指出，許多女性田野研究者報告了相似的隱身經驗，因為女性傳統的社會角色總是躲在男性的背後，成為母親、妻子、護士、祕書或僕人。於是當女人也出現在專業的場合時，田野對象就對她視而不見，或者幫她找到一個適當可以接受的位置，也就是祕書、某位男性的女朋友，或者就只是一個小姐。就算是可以以女性研究者的身分出現，田野研究對象也會經常不自覺地認定「男為主、女為副」；或者男人談男人的事情，女人談女人的事情。經常接觸地方政治人物的 C 說道：

我們團隊的負責人也覺得不應該每次都是他去接觸樁腳，那些人我也應該都要建立關係，所以後來他去拜訪樁腳，都要我一起去。本來是希望一起談事情，就會漸漸熟識，可是對方就會很自然地把他們的太太介紹給我，結果每次都變成他們男的去談事情，他們的太太陪我聊天，或者我們一起哄小孩睡覺。

對於女性的視而不見，或者不願與之談論「正事」，其實反映了男性對於女性的專業知識的不信任，所以認為修橋鋪路是男人的事，小孩子晚上睡不著覺則是女人的事。

另一位女性研究生在賀伯颱風之後，參與學校的規劃團隊到當地勘查、討論災後復建的工作。當地人與規劃團隊的互動與話題，竟是因著團員的性別而不自覺地區分開來。

我也曾遇過對方因為妳是女性而不願意跟妳談太「深奧」的問題。去年暑假到南投做災後的調查，有一個村幹事向我談了風災當天和之後村民的生活狀況，但跟政策面有關的問題卻只和我旁邊的男同事討論。另外一組同學遇到的情況更是明顯，只要向村子裡的人說明來意，村民就會自動分成兩邊。所有的男人就會圍著那位男同學討論起政府哪個單位該負責，哪個單位又該做什麼；而所有的女人就會圍著那位女同學討論起日常生活的不便，對居住地的擔心與恐懼。這時，我會發現因為身為女性，所以妳就被排除在某些議題的討論之外。

同樣地，在另一個台北地區山坡地災害的研究計畫中，一位女研究生負責與當地的王先生聯絡，後來她與兩位男學長到王先生家中進行訪談，王先生也找了幾位當地居民一起來討論。照理說她與王先生較熟，可是在場的人很自然地就分成兩群，男人一群、女人一群。「我和張太太、以及另外一位謝小姐談的大都是家庭、小孩、情緒的話題，而另外兩位學長和王先生談的則是政府、災害處理、危機防範的問題」；等後來大家再圍起來一起談的時候，王先生則「不斷詢問（男）學長們一些專業的知識，例如地錨、斷層、順向坡等很實際的問題」，而她卻只能扮演聆聽者的角色。

舉出上述實例並非對於不同領域的資訊內容有優劣高低的價值判斷，而是要指出女性受到社會角色的限制，以致於難以進入某些領域（通常關乎資源權力分配）的對話。當然，日常生活的貓狗小事與國家大事同等重要，是研究田野必須觸及的不同面向。有很多男性研究者進行田野研究時，只跟當地的頭人接觸，以他們的意見為意見，忽視其他社會位置較低的人，如婦女、兒童、老人與其他弱勢者，所以

有些女性研究者反而會刻意避免只與有權力的頭人接觸，而期待獲得處於邊緣位置、沒有機會發聲者的聲音。然而問題是，社會的性別價值觀將男性與女性規範在不同的領域中，阻礙了研究者進入各種不同社會互動的可能性（或者是增加女性研究者進入決策領域的困難度），同時貶低了女性研究者的專業價值。

（二）女性研究者作為服務者

女性研究者仍然是社會中男性所難以認知的角色，在田野中，女性研究者除了遭受忽視之外，男性會將她置放在一個比較容易接受與對待的位置，而服務者與照顧者就是最常出現的角色。一位女研究生和女性助理，分別描述其經驗：

在社區的時候，男同學要報告，里長就要我倒水，而且還比一個很強硬的手勢，要我去做。放幻燈片的時候，還要我去拉窗簾。這個時候我就被歸類成為女人了。彷彿女人就是應該要做這些事情。

麗枝剛接觸農業局的時候，很容易就和科員們打成一片，但是局長不太理她。她看那些公務員打字很慢，有時候會去幫忙。這是她切入田野的方式。結果有一次縣政府要開一個會議，各局科室要自己做出簡報資料，不是我們的工作，可是她被賦予的任務就是幫他們打字，把所有的報告打出來。她的工作量就變得很大。我們後來就檢討說，淪為高級小妹是不是一個好的切入方式？

另一位女性研究者反省她和公部門「關係」良好的真正意義為何？她說她並不排斥打電話、跑處室、問資料、印大圖這些瑣碎的工作，但是她發現在做決策的時候，在公部門的眼中她又變成是什麼都不懂的非專業者，她的意見還沒有得到討論就已經遭到否決。她不禁懷疑她真的關係良好，還是只是因為別人不願意做那些瑣事罷了。她是享受優惠待遇的獲利者，還是被歧視的犧牲者？

因此，我的「性別」真的讓我在研究中得到了好處嗎？還是它只是讓我淪為「高級小妹」罷了？當我沾沾自喜以為自己占了便宜時，是不是在不知不覺中失去更多？在我自以為得到優惠的同時，得到的是不是只是更大的歧視？

熊秉純（Hsiung, 1996）進行台灣衛星工廠的生產與作業機制的論文研究時，一家木製珠寶盒組合工廠的老闆李先生對她的研究計畫很有興趣，答應幫她忙並且可以介紹她給所有衛星工廠的老闆。她則在工廠幫忙做工以為交換。頭二天，李姓老闆帶著她進行例行衛星工廠訪視，於是她在二天之內就拜訪了七家衛星工廠。沒有訪視的時候，她就待在工廠裡與其他工人一起做工。儘管她的手藝並不怎麼樣，老闆發現多個幫手的好處，於是就不帶她出門一起訪視了。結果她做為工人的角色逐漸取代了做為研究者的角色。她起先並不以為意，覺得能夠有一手的做工經驗也不錯，但是老闆逐漸要求她晚上也要加班，於是做工就占據了她幾乎所有的時間。可是當她提出要到衛星工廠進行觀察的要求，李姓老闆拒絕了。在她堅持之下，老闆才勉為其難介紹她給一家衛星工廠，然而他告訴對方的大意如下：「她只是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女人，想瞭解你們工廠是怎麼運作的。她會幫妳

工作，可是你不必付錢給她，只需買個便當就好。」（Hsiung, 1996: 128）她在做了一個星期的白工之後，老闆告訴她除非再做一個月，否則不會告訴她任何事。誠然，女性研究者也認為在獲取資料的同時，研究者需要回饋田野。但是，她懷疑由於她的女性角色，使得男老闆將她視為廉價勞工，卻刻意忽視其研究者的角色。

Gurney（1985）在警察局進行研究的時候，警察單位也編派給她一個辦事員或祕書的角色，做的其實就是大多數女人所做的工作。藉此她雖然可以認識警局同仁，熟悉警察偵辦案件的類別等，可是在祕書這個位置待得愈久，就愈難轉換成為觀察者的角色，然而觀察決策過程其實才是她研究的目的。做了二個月的檔案管理工作之後，她向督導說明參與觀察決策的意願，也獲得首肯，可是督導還是會有意無意地忘記她這個研究者的存在而沒有通知她出席。因此就一個研究而言，擔任跑腿、服務的工作，或許有利於與田野報導人建立關係，熟悉一些田野事務的運作，但是同時也必須有所警覺，不要陷入這個傳統女人的角色而淪為廉價幫傭，無法進行真正的研究工作。

然而研究者的角色並不是固定、從一而終的。研究者必須既投入、又要保持某種距離，同時扮演很多角色，在不同的角色間跳躍。她不會讓自己受到漠視以致不發出聲音，也不會從頭到尾做一個裝傻的小女生；研究者的行動策略是因時因地、因應當下的情境而變的；即使是面對同一位田野對象，也有可能因為情境的改變而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初入田野的時候，研究者也許是不自覺地回應著田野的性別規範或分工，但是當她對田野愈來愈熟悉，她對於角色的選擇與運用就能更清楚地轉換。在大陸深圳的台商工廠進行研究的 L 說到她的多重角色運用：「在工廠工作的台灣男性非常無聊，壓力又很大，這種狀況下，傳統女性的角色，像聆聽者、安慰者就很有用。」然後她

看到自己在台商工廠裡吃人家住人家的，又想獲得別人的資訊，覺得自己也應該扮演一個對別人有意義、有用的角色。剛好她發現工廠裡的大陸廚娘是廣東人，煮的菜都是酸酸甜甜的不合工廠員工的口味，於是有天她就煮了一道苦瓜排骨湯，他們吃得好高興。後來她就偶爾下廚，也教那個廚娘燒些台灣口味的菜，他們很高興說：「L 小姐好能幹，又會唸書又會煮飯。」而每天一起吃飯培養出來的信任，使他們告訴她很多內幕，也願意帶她去唱卡拉 OK 的場合。這些社交場合是商人交換訊息、建立社會網絡的地方，對她的研究非常重要。

儘管和男人一起到那裡會被誤會成是特殊行業的女人，或是女秘書兼情人，但這時候我必須放下身段，也唱歌，也和他們跳舞，不能說我是研究者，我要有女性自主權等等。做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在這裡我也不得不承認，我必須運用做為女性的優勢角色，因為整個研究的劣勢太多太明顯了。

另一位女性研究人員在宜蘭漁村做田野調查的時候，在當地男人圈子中頗受稱讚，因為男人和魚販商談賣魚契約時，是她幫忙起草契約書；舉行廟會的時候，她扛著錄影機跑前跑後；來田野工作室吃過她燒的菜的田野居民則知道她的烹飪技術還不錯。對於田野裡的男性來說，讀書與體力勞動是男人的事，而煮飯是女人的事，相對於田野中的女性，她僥倖在兩方面都符合標準，所以在男人圈子所獲得的評價要比在女人圈子還高。她的經驗和台商工廠的女性研究者 L 所得到的評價：「又會唸書又會煮飯」如出一轍。

近來有關研究方法、研究倫理的文獻中，許多女性主義者強調非階層性、平等互惠的研究伙伴關係，也就是研究者不應該是田野的資

料掠奪者，研究者也要自問可以為田野帶來如何的改變與好處。然而如何在服務報導人與進行研究之間取得時間與心力上的平衡，又如何在擔任服務角色與專業能力之間取得另一種平衡，是女性研究者共同面臨的考驗。當然，男性研究者也面臨相同的難題，然而女性研究者有時更要先努力克服遭受忽視、貶抑、成為服務者的角色，抵擋性騷擾與追求，然後才能進一步在研究專業上求得表現。換句話說，女性研究者尤其需要特別的努力，才能兼具「沒有威脅性」以及「專業能力信任」（Gurney, 1985）。

（三）女性研究者的身體：男人的凝視、調情、追求與性騷擾

前節敘述田野報導人對於女性研究者視而不見，其實並非真的沒有看見，而是看不到女性研究者的研究專業角色；反過來說，女性研究者的身體或情慾客體的角色反而可能特別凸顯。在前例不受鄉公所人員正眼看待的女性研究者，到了晚宴卻搖身一變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她說道：「到了晚上工作告一段落，大家一起去唱卡拉 OK，情況又不一樣了。男士唱歌的時候，總是叫我陪唱，每一個！我被當成陪唱小姐了。」也就是女性研究者在「研究」的情境中隱而不見，但是在非研究的社交場合中，其「女性」身分卻又馬上凸顯出來。從事規劃工作的 C，談到她經常接觸的地方政府官員的一般態度：

我還碰過一位鄉長，我一去，他就問說：「小姐你幾歲啊？我看你才十八歲而已，一朵花喔。」我覺得他們的態度是很挑釁的。……他對年輕男性規劃師就會說：「啊，真是英雄出少年啊，你這麼年輕就……。」口氣完全不一樣。

就讀碩士班的女研究生反映，報導人在整個田野調查過程中從頭到尾沒有理她，臨走時卻問：「妳結婚了沒有？我們那個單位有很多博士……。」男性報導人也許本身沒有調情與追求之意，但是此對話意涵其認為婚姻是女人的歸宿的看法。

此外，「女性是弱者」這樣根深柢固的性別觀念，雖然給女性研究者帶來一些工作上的方便，同時也正是女性在田野很容易遭受各種不同程度性騷擾與性侵犯的來源。在我們訪談的過程中，許多女性受訪者最先談到在田野碰到的問題，往往就是騷擾或性騷擾。以下是幾種常見的騷擾方式：

1. 田野研究對象會對女性研究者訴說超過彼此交情的私事。例如，研究田野裡一位五十歲左右的男人向二十餘歲的研究者 J 訴苦，抱怨自己的親密關係出了問題。J 轉述道：「吃飯的時候他就跟我們講一些他自己婚姻的事。說今天是他老婆生日，可是他沒幫她慶祝，反正兒子快滿月了，就跟滿月酒一起辦。又說兩人其實沒結婚，只是同居，他老婆的年紀差他一大截，沒甚麼話說，也沒溝通……。」報導人對女性研究者說這樣的話，一方面反映男人習慣於把女人當作情緒發洩的出口，冀望得到女性的安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藉此釋放感情與婚姻的訊息，試探交往的可能性。然而因為對方是社區的意見領袖，J 為了要維持關係，還是要忍氣吞聲與之互動。

2. 言語上的性騷擾。從事山區漢人村落研究的 J 提到，村落裡的中年男性對女性研究者說：「妳結婚了沒有？妳上次來過以後，我們這裡就有人說要活標妳喔。」而從事原住民部落研究的受訪者 K 則說：「有時候去訪談一群男生，他們用母語講一些虧你的話，你也只能裝傻，裝作沒聽懂，讓他們高興地笑一笑，覺得有占到你的便宜。可是我實在不喜歡那種感覺。」在這個實例中，性別、階級與種族等

幾種社會位置交織在一起，然而 K 的經驗是性別在身上的作用甚至超過種族，因此她沒有做為漢人的原罪，反而有「性別被壓迫的意識」。她說明：「因為我覺得性別壓迫甚於族群壓迫。即使我今天是一個漢人、博士班的女生那又怎麼樣，妳在部落做田野的時候，妳還是個女的，隨便一群男人就可以把妳怎麼樣。」然而也正因為 K 有著強烈的性別意識，讓她在進行部落研究的時候，會用更為敏銳的眼光來觀察部落中婦女的生活。

3. 過度的關心、照顧與情感追求。例如受訪者描述如果在村落裡稍微待久一點，就會有一些年輕男性來煩她：

對妳照顧太多，後來我都覺得連那種人際關係都有一點變成是我做社區工作的負擔了。照顧太多的意思就是說，拿飲料給妳喝啊；妳只是要走兩步去隔壁那一家，他就騎摩托車一直跟妳，一直說他要載妳過去，然後一直問妳晚上有沒有空，要不要去海邊散步。如果妳拒絕非常多次，他就會一直說妳不要這樣子，會表現出他非常失望，也沒有要怎樣啊，只是去吃吃喝喝而已啊。

每天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直來煩，找妳去釣魚，找妳去吃什麼，可是妳又不能每次都拒絕。在田野裡，我常常必須單槍匹馬地面對那個情況。實際上有很多男人，他是希望跟妳一對一的，就一直要求，我實在是不堪其擾。可是其他人看到表面，就會說，妳是我們所有人裡面跟社區關係最好的。（T）

4. 以提供資料來交換人際的邀約。例如 J 提到一位三十餘歲的田

野報導人：「他是社區組織的重要工作人員之一，也是我們將來常常要接觸的工作對象。他半開玩笑地說：你們想要資料，就要跟我去吃飯。」

5. 身體的性騷擾與侵犯。除了身體的凝視、追求調情之外，也有受訪者提到在田野中遭受男性身體騷擾的經驗：「那個先生和我們坐車到一個民意代表家，他叫別人先下車，他有些話要跟我講，就在車上，後來他就開始摸我的頭髮。」(K)「一個年輕人，他有喝酒，可是我覺得他沒有喝醉，因為他是平常就有在喝酒的人，結果他真的就是……，一直看我，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了，後來，真的很突然，他馬上就這樣撲過來，真的耶，真的就是被他撲到耶……我就一直推一直推，跟他說：『你不要這樣，我不喜歡。』結果還好他也沒有怎麼樣。」(T)

不論是異文化或同文化的研究，都有女性研究人員遭遇性騷擾的案例，甚至在同一個田野不只遭受一次的侵犯。遭受性騷擾與侵犯的經驗使她們恐懼或嫌惡，但是礙於工作目標、個人的理想、生涯發展，她們不但不能理直氣壯地對侵犯者直接反抗，甚至被侵犯的當下還要顧慮到日後的關係，使田野工作倍加艱辛，嚴重影響工作士氣。

不只是性騷擾，即使遇見言語的性別歧視，為了研究的繼續進行，研究者也經常要忍氣吞聲。嚴祥鸞（1997）在科學園區進行田野研究，她說明了自己面對遭遇性別歧視時的態度：

以我在訪談過程中碰到言語的性別歧視經驗，有時候會立即反駁，有時候則不反應。立即反駁，關係破壞，訪談勢必停止；不反應則為維持研究關係，研究可以持續。由於我的研究主旨在於性別或階級平等的追求，常會為如何反應和反應的後果陷

入懊惱和衝突的矛盾。對於懊惱和衝突的妥協，我常會以「能夠達到目的就值得」安慰自己。這就是我以實地場域政治交換我學術發展代價的最佳實例。（嚴祥鸞，1997: 212）

總括而言，女性研究者面對田野中的身體、性與感情的問題時，她們的行為反應透露了田野工作中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Warren, 1988）。因為對於田野對象的感恩（允許妳來做研究）、為了維持和諧的研究關係，以及為了抵抗學術界的性別歧視，她們必須以妥協的姿態來反應，致使這一類的遭遇便只能停留在閒談或軼聞的層次。Gurney（1985）認為這個現象最能反映出學術界的性別規範。由於學術界對女性的研究成果向來有「缺乏信度」的歧視，導致女性無法在呈現田野經驗時討論與性別有關的問題：「為了避免她的研究顯得不可靠，她會忽視甚至否認田野工作所經歷的困難，因為任何與田野對象關係上的失誤，將會導致別人懷疑她所蒐集到的資料」（Warren, 1988: 38）。確實，處在性別歧視的社會中，要有相當的勇氣才能不畏懼旁觀者的二度傷害，敢於說出自己受到騷擾或侵害的經驗。在此次訪談過程中，受訪者一聽到研究的主題是「田野研究中的性別議題」時，她們第一個想到要訴說的就是性騷擾與性侵害。這個一致性反映出男性與女性研究者之田野經驗最大的不同；而在敘說的同時，受訪者也期待能夠作為其他女性研究者在田野工作的預警，而女性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也同時在其中滋長。

（四）善用女性優勢的弔詭

女性研究者沒有受到嚴肅對待，有時候也可能帶來好處，例如幫

助研究者進入原來難以進入的田野。如果年輕女性研究者被認為沒有權力、沒有威脅性，則研究對象會允許她聽到某些事情。田野研究對象認為女人對於重要事情所知不多，所以女性研究者可能是無害的（Warren, 1988）。在中國大陸做研究的 L 發現：「一般人對單身女性比較沒有戒心，所以容易和陌生人展開談話。如果和在田野認識的人成了朋友，他們會同情妳，覺得妳孤伶伶一個女孩子在外奔波，常常會請妳回家吃飯，問妳有什麼需要幫忙。」女性研究者很快就意識到「女性是弱者」這個刻板印象使人們比較願意照顧或保護她，也比較願意接受訪談，舉一反三的研究者知道這個印象的延伸就是「女性可以裝傻或耍賴」。年近三十的 C 在田野研究時遇見一位年約三十多歲的男性科長，就很直覺地運用女性的身分切入田野。她說：「就很本能地用一個女人的方式，有點撒嬌啊，用這種方式把關係建立起來，就會很熟。……這好像遊戲，對年輕人應該蠻管用的。」但是她也語帶保留，擔心基本教義派的女性主義者會不以為然。目前正在唸博士班、從大學時代就經常下田野的 K，在研究攤販的時候就曾經故意裝作什麼都不懂，在警察眼裡不會構成威脅，她因此能夠在旁聆聽警察的閒談。

較早以前，我訪談的都是攤販老闆、跑江湖的男人啊，他看我小小年紀什麼都不懂的樣子，就很願意教你這個教你那個，裝傻是比較容易被包容和原諒的。有一次因為我想知道攤販和警察的關係，他還帶我去警察局。他們聊天，我就在旁邊喝茶嗑瓜子，一副不懂事的樣子，警察也不把我放在眼裡。結果就聽到好多事情。

Nancy Macdonald (2001) 根據其研究塗鴉次文化的經驗指出，由於她是女性、又是局外人，代表一種安全的聽眾，反而可以進入男人私密的領域。在塗鴉次文化裡，塗鴉者要隨時展現男性氣概，但是在女性（研究者）面前卻不必如此，這使得她反而有可能進入比較屬於情感層面的領域。面對田野中的男性，女性研究者如果有能力且願意處理風險，則可能運用女性特質來操縱男性研究對象以獲取資料（Easterday, et al, 1977），然而互動是雙方的，操弄女性特質也會同時帶來困擾，必須小心處理。女性研究者有可能因此進入了未明言的承諾（unspoken promises）當中，如果拒絕男報導人進一步的追求，有可能觸怒對方或傷了對方的心；如果接受對方的繼續追求，有可能讓自己陷入新的關係之中（Horn, 1997）。受訪者 T 就指出，如果利用女人的吸引力來進行研究，有可能未來會讓報導人難過或者為自己帶來不必要的困擾。

我們去田野的時候，對我這樣單身的女孩子，隨時都有一大堆男生在旁邊，他們是很熱情啊，就是買飲料啊、跑腿啊，都很好啊。可是我覺得我不是要利用他們的感情來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我都非常小心處理跟他們的關係，因為我覺得一不小心可能害別人很難過。

也有人寫信給我，送一個小雕刻給我，那都已經超過我可以處理的範圍了，因為我不想利用自己性別的優勢從中獲利，所以處理那些事對我而言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困擾。

性別意識敏銳的人或許要批評，這種利用女性特質的行動方式不

過是複製了既有的性別權力關係，對於女性研究者的工作處境終究難有改善。有些女性研究者質疑，女性研究者之所以容易打入田野、建立關係、蒐集資料，恐怕仍然是以不影響與不危及田野的根本權力關係為前提才有可能。研究對象會把比較無關緊要的訊息透露給女性研究者，但是真正與權力相關的關鍵資料，恐怕仍然不易獲得。女性研究者如果只是以傳統的性別角色與田野研究對象互動，又是否有改變性別結構的可能？一位熟讀女性主義理論的博士班研究生即表示，當我們談到研究者是否該「善用」女性特質所帶來的方便與好處時，應該更深一層討論的是所謂的方便與好處有哪些？背後的本質又是什麼？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田野的研究對象在帶給女性研究者方便與好處的同時，是否也帶給她們某些限制與障礙？她認為：

其實這些方便與好處仍是扣合到傳統的性別角色價值，由於對善良、單純、柔順等女性特質的認知，因此在某些狀況下女性較男性更易接近某些資源，不過這些資源背後通常不會牽涉到太多的權力，或是認為女性也「無能力」去利用這些資源改變權力結構與分配。甚至由於女性對於某些資源的便於取得，造就出特定的「性別」分工。最後的結果是將女性推至性別刻板印象的框框裡，甚至抹滅了女性研究者在研究中的努力與付出。

然而，對於性別議題的討論也不能脫離行動者的情境脈絡，在研究或規劃工作的壓力下，所以也有研究者主張行動者的第一要務是必須進入田野，受訪者 L 稱之為「破冰策略」，她認為必須要在順利進入田野之後，然後才有後續行動和反省的可能。

（五）田野中的性別政治與知識生產

Warren（1988）批評白人中產階級男性的知識論預設——男性是客觀的、理性的、思考的；而女性是主觀的、富於情感的、自然的；因此男性居於社會文化的主導地位。此一知識論的預設導致了研究時對於女人視而不見，例如 Malinowski（1979）研究 Trobriand Island 文化時，僅著重於男性交換貝殼項鍊的功利主義（尋求政治結盟與權力），卻完全忽略女性交換項鍊的儀式具有不同世代連結的社會意義。因此討論田野研究中的性別處境與政治，不只是關乎研究方法與研究倫理而已，也會與在此情境下所生產出來的知識內容有關。

受訪者 W 當時正進行大甲媽祖進香的研究，雖然是延續學術界過去既有的研究，但是她已經把研究的視野從傳統的著重於頭家、爐主、搶香團體、陣頭等儀式本身，推進至分析男性在整個儀式過程扮演主導角色，而絕大多數的隨香者卻是女性（尤其是貧窮的女性）這個現象。這些女性的生活經驗與進香有密切的關係，女性進香者藉由朝聖過程膜拜媽祖的儀式，洗滌生活的痛苦與疑慮。她認為，媽祖信仰與儀式，正是一種社會結構性強勢文化下，「邊緣者」或「弱勢者」的力量之展現。

人類學者 I 發現，「台灣社會是一種中國式的社會」這個既有概念所指涉的強調傳統禮教的保守社會，和她在台灣農村的田野觀察並不相符，她開始將注意力轉到「在正式的、官方模塑的形象之外，台灣社會底層真正的文化結構是什麼？」她對於台灣農村的研究，特別注意一些「非正式的」發展現象，例如婚姻問題。所謂非正式的、婚前懷孕的現象經常受到忽略，經過她的研究發現，此一現象在農村反而是更普遍的。她認為在不斷的社會變遷中，台灣的社會已經離傳統

的社會概念很遠了。

受訪者 K 的研究田野是康樂隊，她描述其初期參與觀察的情景：

在康樂隊的表演場上，我經常要面對上百隻凝視的眼光，因為我隨時在場子裡走來走去，等待歌手下場，抓住短暫的時間遞上名片，留下聯絡電話。最尷尬是在台上有脫衣舞表演的時候。第一次看到時，我實在覺得很不好意思，也很難過女人的身體竟然被如此物化地觀看，我的眼光總不敢正視台上光溜溜的女體，有一種邪惡與罪惡的感覺，更不好意思去看旁邊的男性觀眾，原來男女之間連觀看的視覺權力都有如此大的不平等。

上述所描述的感覺正好說明她起初還是在男性建構的意識下觀看康樂隊的演出，此後在與一些歌手進行訪談之後，她的觀點開始有了轉變。她認為傳統的觀點強調女性受男性迫害的凝視，固然點出了女性的身體如何成為男人性慾的對象，但是卻忽略了女性的情慾主體可能。她發現「在進入女性的意識與思考脈絡之中，新一代的女性其實已經可以比較主動而自願地選擇表現自己情慾主體的方式，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身體，並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可能是一種什麼樣的武器。」

結 語

本論文處理的是女性研究者在田野研究中的性別處境與政治，然

而田野是社會一環，也處在社會的性別結構之中。受訪者所研究的田野並非是具有高度性別意識的婦女團體，使用的方法並非是私下一對一的深入訪談，加以研究者、教授在主流男性的價值系統中仍然屬於男人的範疇，不像護士、幼教老師、祕書是社會認定的女性工作，因此女性研究者所面臨的處境與其在其他社會情境，尤其是女人處在非傳統女性工作領域的經驗有著高度的類似性。

Reinharz (1985) 回顧當代社會學經典中的性別歧視，揭露了沒有性別意識反省的男性社會學家眼中的女性形象。父權社會裡的男性社會學家不只是以社會學家，而且是以男人的眼光來看待世界，通常是以充滿攻擊、操縱、性意味的方式。女人被視為物 (object)，是男人觀看、選擇、擁有、性慾的對象。女人是情緒化的、沒有理性的、男人無法理解的、令人厭煩的。這並不是「寫作風格」的問題，而是這些意象背後的社會學想像。它反映了社會上將女人視為「愚蠢、沒有性吸引力的太太」或「性慾望與暴力的對象」的價值觀。

Anonymous (1980) 觀察建築系女學生在學校的求學經驗，展現視而不見、蔑視與聚光燈效應等三種特質。視而不見是建築系學生最常提到老師對待他們的方式，通常女生提出問題或是回答問題時，老師像沒有聽到一樣，然而當男生提出相同意見或答案時，卻大獲讚賞。此外，教授對女性建築師的表現沒有信心，或是根本不加期待。而輕蔑與敵意，往往透過不信賴學生的能力而展現。這種迂迴的手段往往比直接的批評更難以應付，因為妳無法與他討論，也無法正面回應。聚光燈效應則指的是，男性教師往往看重女學生的性別更甚於她的專業學術表現；或者懼怕與女學生的接觸，轉而採取保持距離的態度。這些態度都影響女性學生的正常求學機會。

Hendensohn 所研究的女警指出她們如何受到男同事的對待：

「無論妳是怎樣的人，他們都會把妳歸為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以稀釋或否認妳所做的事情。女警只有二種刻板類型：妓女與女同性戀。女人得不到好的典型形象，而且這二種都有很強的性意涵」（轉引自 Horn, 1997: 298）。Hunt（1984）加上了第三種刻板形象「道德女」（moral woman）。她們被視為是待在家裡，不受骯髒政治污染的道德女，其行為總是充滿了關愛。Horn 認為女性研究者進入田野將會面臨與女警察相似的困境。女研究者也許不必像女警一樣需要藉由處理鬥毆與暴動來證明自己的能力，但是她仍必須去證明自己是有能力／且值得信賴的研究者。

對照上述文獻中的女建築系學生、女警察，本研究中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的經驗還有不少相似之處，即使本文的受訪者並沒有提到田野報導人會以女同性戀來稱呼女研究者，然而對於處於非傳統角色的女性所受到的視而不見或成為情慾對象卻如出一轍。亦即報導人較不關心或不重視「女性研究者」的專業「研究」能力與角色，卻過度凸顯其作為傳統「女性」角色以及男性異性戀情慾的對象。這個發現正如 Warren（1988）的觀察，女性在田野中被指定的位置，和女性普遍的社會位置是一致的：即做為撫育者、溝通者、情緒勞動者，以及性對象。

本文雖然將焦點放在受訪者共同面對的田野性別處境，然而性別與年齡、階級等其他社會類屬交織在一起作用。譬如年紀較輕的研究者比較會得到貶抑的稱呼，如妹妹、小丫頭；穿著看起來較年輕的衣服，如牛仔褲、涼鞋，會比穿著長裙、高跟鞋，較得不到田野報導人的嚴肅看待。而如果研究者的身分相對於田野的社會位階較高時，有時可以衝破田野中對當地女性所設的性別規範與界線。例如女性研究者 Y 在好米村的時候，注意到了農村對於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員格外

敬重。由於她們所做的規劃案是與縣立文化中心合作的，村民誤以為她們也是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員，使她們一到田野就受寵若驚。而在重男輕女的風氣更勝台灣本島的澎湖縣村落，清明祭祖之後名為「吃祖」的宴席，向來不准女性出席。只見男性圍桌大快朵頤，女性則忙著張羅各種吃食，隨時提供各種服務。唯一例外的，就是已經長期在此田野進行研究的女性研究者。男性的村民以大學生、老師、教授這樣的等級來認識這些研究者，在這樣的理解下，她們受到村民的力邀，可以和男性在宴席上平起平坐。

女性研究者的田野性別處境，是植基在社會主流性別價值系統的脈絡之下，社會對於女性有其性別角色期待與互動方式，對於男性同樣如此。在社會學界裡，要成為專業者，就必須要客觀、保持距離、非個人、權威、競爭、克制感情、堅強。因此成為專業者，其實就是要成為「男人」(Reinharz, 1984)。在這樣的性別觀之下，不符合此種專業形象的男性研究者同樣會受到不同的待遇，甚至貶抑。一位男性研究生因為喜歡搽香水、打扮，穿著比較鮮豔、可愛，於是有關「政策」這種屬於專業的話題也就比較不會落到他的身上。他與同學到社區參與當地規劃，因為他的穿著與行為舉止，不符傳統男性的形象，社區的男人就把他當作小孩子，而社區媽媽尤其喜歡他，常常跟他談論家裡的事情。另一位不符合傳統「男子氣概」的男性研究生，因為陰柔的聲音與腔調，不只經常遭受田野研究對象的嘲笑，也遭到研究團隊夥伴的挑戰與傷害。他寫道：「人們狀似好奇地，訕笑我不純正的男性聲調（或者他們叫做的『娘娘腔』），然後模仿以取悅眾人（甚至包括我的研究調查團隊的伙伴），眾人大笑一陣，包括我的同伴，這竟然是我的同伴？那竟然是我關心的民眾？」他覺得深受傷害，可是心中的氣憤卻又不能對著社區居民發作；研究伙伴沒有伸出

援手，更是讓他難過。

本研究的限制是主要處理了不同年齡與研究位階的異性戀女性研究者的田野（社區、村落、部落等）處境，但是並沒有處理女性研究者面對具有高度性別意識的田野（如婦女團體）會有如何不同的研究經驗。此外，也沒有處理同性戀議題，一方面田野的報導人並沒有像西方文獻（參考 Horn, 1997）所說，會將比較不女性化的女性研究者稱為女同性戀；另一方面本研究並未接觸自我認同為女同志的受訪者，所研究的田野也不包括女同志空間。如對此議題有興趣，可以參考由 Ellen Lewin 與 William Leap（1996）所編輯 *Out in the field* 一書中來自男女同性戀研究者的研究經驗反省。

參考文獻

- 林秀芬 (2002) 〈絕處逢生：探討九二一地震喪偶女單親災變後之社會支持過程〉。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胡幼慧編 (1996)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 唐筱雯 (1999) 〈台北市公娼之從業歷程及生活世界〉。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高敬文 (2002) 《質化研究方法論》。台北：師大書苑。
- 黃瑞琴 (1994) 《質的教育研究方法》。台北：心理。
- 齊力、林本炫編 (2003) 《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 潘慧玲編 (2004) 《教育研究方法論：觀點與方法》。台北：心理。
- 謝臥龍編 (2004) 《質性研究》。台北：心理。
- 嚴祥鸞 (1997) 〈訪談的倫理和政治：女性主義社會學者的自我反思〉，《婦女與兩性學刊》，8: 199-220。
- Anonymous (1980) No academic matter: Unconscious discrimination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education. In G. R. Wekerle, R. Peterson & D. Morley (Eds.), *New space for women* (pp. 219-234).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Bell, D., Caplan, P., & Karim, W. J. (Eds.) (1993) *Gendered fields: Women, men and ethn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 Easterday, L., Papademas, D., Schorr, L., & Valentine, C. (1977) The making of a female researcher: Role problems in field work. *Urban life*, 6(3): 333-348.
- Ellis, C., & Flaherty, M. G. (Eds.) (1992)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Newbury Park: Sage.

- Freeman, D. (1983)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rsity Press.
- Gadamer, H. (1989) *Truth and method* (2nd ed.). New York: Crossroad.
- Golde, P. (Ed.) (1986) *Women in the field: 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 (2n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urney, J. N. (1985) Not one of the guys: The female researcher in a male-dominated setting. *Qualitative sociology*, 8(1): 42-62.
- Haraway, D. J.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Harding, S. (1991)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obbs, D., & May, T. (Eds.) (1993) *Interpreting the field: Accounts of ethnogra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orn, R. (1997) Not 'One of the boys': Women researching the police.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6(3): 297-308.
- Hsiung, P.-C. (1996) Between bosses and workers: The dilemma of a keen observer and a vocal feminist. In D. L. Wolf (Ed.),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pp. 122-137).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Hunt, J. C. (1984) The development of rapport through the negotiation of gender in field work among police. *Human organization*, 43: 283-296.
- Jackson, B., & Ives, E. D. (Eds.) (1996) *The world observed: Reflections on the fieldwork proces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Lewin, E., & Leap, W. L. (Eds.) (1996)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Lewis, O. (1951) *Life in a Mexican village: Tepoztlan restudi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acdonald, N. (2001) *The graffiti subculture: Youth, masculinity and identity in London and New York*. New York: Palgrave.
- Malinowski, B. (1967)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Malinowski, B. (1979) *The ethnography of Malinowski: The Trobriand Islands 1915-18*. New York: RKP.
- Markowitz, F., & Ashkenazi, M. (Eds.) (1999) *Sex, sexuality, and the anthropologi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ead, M. (1949)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 Redfield, R. (1973) *Tepoztlan: A Mexican village: A study of folk lif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einharz, S. (1984) *On becoming a social scientist*.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 Reinharz, S. (1985) Feminist distrust: Problems of context and content in sociological work. In D. N. Berg & K. K. Smith (Eds.), *Exploring clinical methods for social research* (pp. 153-172). Beverly Hills: Sage.
- Shaffir, W. B., & Stebbins, R. A. (Eds.) (1991). *Experiencing fieldwork: An inside 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Sage.
- Smith, C. D., & Kornblum, W. (Eds.) (1996) *In the field: Readings on the field research experience* (2nd ed.). Westport: Praeger.
- Warren, C. A. B. (1988) *Gender issues in field research*. Newbury Park: Sage.
- Warren, C. A. B., & Hackney, J. K. (2000) *Gender issues in ethnography* (2nd ed.). Thousand Oaks: Sage.
- Wengle, J. L. (1988) *Ethnographers in the field: The psychology of research*.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Wolf, D. L. (Ed.) (1996)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Boulder: Westview Press.

附錄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訪談時的年齡	工作／學歷	婚姻	學術領域	田野
C	30	研究助理／碩士	已	都市規劃	某縣綜合開發
F	30	研究人員／碩士	未	社會科學	台灣東部
H	43	研究人員／碩士	已	人類學	都市原住民
I	45	研究人員／博士	已	人類學	台灣農村
J	27	研究助理／學士	未	空間規劃	台灣北部山區
K	30	博士班研究生	未	社會科學	大海部落
L	36	教授／博士	未	地理	中國大陸工廠
M	26	碩士班研究生	未	社會科學	台灣南部農村
N	29	研究助理／學士	未	空間規劃	離島
S	36	博士班研究生	已	人類學	台灣中部工廠
T	25	研究助理／學士	未	空間規劃	巨木部落
W	44	研究人員／博士	未	人類學	台灣中部
Y	28	研究助理／碩士	未	空間規劃	台灣東部農村

附錄二 後記

畢恆達

寫完此論文之後，我在另一個性別研究脈絡中，也在思考為何男性會排拒女性主義、不參加性別相關的演講與活動，為何幾乎所有的性侵害加害者都是男性（占 98%），更廣義來說，男性與女性的關係為何？我得到的結論是，從男人主觀的角度來看，男人與女人的關係主要有三種：

1.男人將女人視為情慾的對象：從街頭男人凝視的目光、無所不在用女性身體來販賣商品（從女體廣告到資訊展的 show girls），一直到每日都在發生的性騷擾與性侵害事件，凸顯出女人的身體是男人情慾投射的對象。

2.男人將女人視為服務者：女人提供男人情感與勞動的服務。男人接受女人的關懷、情緒的安慰；結婚前受到媽媽照顧、結婚後由太太照顧（家務勞動）；男經理有女祕書、男教授有女助理幫忙處理日常的庶務。

3.男人將女人貶抑成為弱者：一種是以愛之名，對女人進行（過度）保護。學校用高牆、碎玻璃與鐵絲網來保護住宿的女學生，家長不放心女兒單獨出門在外過夜，甚至連走路過馬路男人都要擔任保護者的角色。另外一種則是直接貶抑的方式，來維護男人的優越感與自尊。曾有婦女團體調查，先生最常對太太說的一句話是「妳好笨」。結果呢，男人就是很難將女人（尤其是親密關係中的女人）視為可敬的對手，進而欣賞其才能與成就。有太多的實例是，在工作職場上能力高強的女性，一方面要非常和顏悅色對待男部屬，不要讓他們覺得受到壓迫，一方面行事要低調，以免先生的面子受損。為何先生就不

能成為一位欣賞者呢？為何太太（女人）的成就會成為危害先生（男人）尊嚴的來源？

另外一種情況是，男人確實也佩服社會上極少數有傑出表現的女人（給她們女強人的封號），但是卻用「像男人」、「表現得跟男人一樣好」來稱讚女人。於是，男優女劣、男強女弱這種男女價值二分系統，並不會因為有愈來愈多成功的女性而受到挑戰。而娘娘腔（展現女性氣質或向女性學習的男性）也就持續遭受社會大眾的歧視。然而當女人跳出來，舉出社會的性別不平等的現象，要求政策要特別回應女性的需求時，男人又會說女人這樣做是自貶身價。

這個結論與本研究發現非常一致，也就是說研究田野也是社會的一部分，女性研究者無法脫離作為社會中女性的位置。因此，在進行訪談之初，女性受訪者得知研究的焦點在於女性研究者的田野經驗時，她們最常敘說的就是田野中的性騷擾經驗；除此之外，她們也敘說了遭到視而不見、貶抑稱呼，以及作為服務者的角色。面對如此不利於女性研究者的社會處境，她們不是只有逆來順受而已。當然面臨「或者維持田野中的人際關係，或者挑戰其中的性別歧視」的兩難抉擇，一直困擾著女性研究者。她們通常表現得有禮貌或者忍氣吞聲，以讓研究得以繼續、完成。針對男性個人的挑戰可能會危及田野的社會關係，但是等研究完成之後，仍可以藉由論文發表與寫作對社會的性別結構進行批評與挑戰。此外，研究發現女性研究者比較容易跳脫傳統男性主流的價值觀，從社會中的邊緣、受壓迫者的經驗出發，進而解析社會的壓迫結構系統；有的研究者更進一步連結、引爆（empower）田野中的女性，企圖改變田野中的性別價值與權力結構；有的則不是將研究視為外在知識的累積，拿了田野資料就跑，她們一方面思索田野社會處境的改善，一方面在研究過程中產生自我的轉變。

Gender Politics Affecting Female Researchers in Their Field Work

Herng-Dar Bih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ally Shieh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lthough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ield experiences of male and female researchers generally vary, most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extbooks still neglect to discuss the impact that gender issues have in the course of a field research. Thu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ways in which gender politics may affect female researchers in their field work.

When a researcher begins her field work, informants often try to allocate her an appropriate position. In the meantime, the researcher herself strives to negotiate the new relationships in an effort to find her place. As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study's interviews suggest, the ways female researchers are treated during their field work generally reflect the gender values shared by the larger society. Thus, informants often ignore female researchers' professional roles, and instead expect them to assume traditional female roles, such as care-giving and emotional labor, or even treat them as sexual objects by focusing on their bodies.

Is sum, this paper discusses what strategies female researchers employ to negotiate such gender politics and how their gender consciousness affects the outcomes of their field research.

Keywords: gender politics, field research, female researchers

◎作者簡介

畢恆達，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主要教授課程與研究方向：環境心理學、性別與空間。

謝慧娟，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

◎聯絡方式

E-mail: hdbih@ntu.edu.tw